

学以为己:《论语》论学习之道

冯 兵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4)

摘 要:《论语》大量记载了孔子关于学习之道的言论。孔子强调人能弘道,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天赋等的差异,但学习既是可能的,也十分重要。同时,学习最根本的目的是完善自我,成就自己的德与才。而就学习的核心内容来说,从《论语》的记载看,主要是指诗与礼。在学习方法上,《论语》重点提到了学无常师、一以贯之、学思结合等数个方面。在学习态度上,孔子最重视的是好学不厌,而乐学则是其极力推崇的最高学习境界。在这一点上,孔子自身即是典范。《论语》所呈现出的孔子关于学习之道的种种言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学习理论,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论语》;孔子;学习之道;“为己”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4-0020-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402

《论语》开篇即讲学习之道。其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故以“学而”为第一篇的篇名。孔子对“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关于“学”,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解释道:“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也。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也。”^[1]古人言学的根本宗旨就是体道修身,成就君子之德。而君子以身垂范,为学修身的同时也就是在施教于人,并且教学相长,教诲、教化亦能反哺为学与修身。因此,在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施教者努力为学修身即是在开展教化,而受教者接受教化亦是在为学修身。孔子自述其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说明“学”与“诲人”在孔子的生命活动中始终都是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孔子的一生“充满政治色彩,但更富有教育气息”^[2]。同时,也正是在不断地“为学”与“诲人”中,孔子提出了大量的关于学习之道的看法,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学习理论。

一、学习的可能性与重要性

孔子明确谈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强调人具有弘道的能力。朱熹释“弘”为“廓而大之”,即弘扬、光大。而人之所以对于“道”能够具备这一主观能动性,就是因为“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3]。人有知觉运动能力,而“道”只是一抽象的客观存在,所以只能是作为认知对象,不具备主体性。同时,“道”在不同的语境中亦可具体化为不同的哲学与伦理学范

收稿日期:2024-07-20

作者简介:冯兵(1974—),男,重庆奉节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曾子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等。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宗教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235)。

畴,比较常见的如理、性、仁、义、中庸等,它们都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需要体认和把握,也是经过努力后可以体认和把握到的对象。如孔子曾强调说:“吾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又道:“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这都说明孔子充分肯定人人皆具有学习、体认“道”的天赋与能力。

孔子也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天赋上的差别,譬如“上知”与“下愚”(《阳货》)、“中人以上”“中人以下”(《雍也》)、“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季氏》)等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指智力的高低。而且孔子还强调“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主张智力上的先天差距无法改变。除了智力天赋的区别之外,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个性气质的不同。他对自己的学生各有点评,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师也过,商也不及”(《先进》)、“回也不愚”(《为政》)、“由也好勇过我”(《公冶长》),等等,并因材施教,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和问题予以有针对性地提点和教导。与此同时,孔子又能看到弟子们因个性气质的不同而各有所长,比如其在多年后回忆起陈、蔡之厄时,就将当时追随于身边的弟子们做了分类,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这一分类并不完整,其中如曾子、有子等孔子晚年的一些重要弟子因当时并未从游,就不在其列。不过从中我们的确能够了解到,孔子对门下弟子不同的气质禀赋有着基本客观和准确的把握,这是他在教育方面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

孔子虽然一方面承认天赋的差异性,并认为智力的差别无法改变,但其同时也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强调人既已为人,人与人之间在人性上基本就是一致的,重点只是在于各自后天习得水平的差异,这便肯定了学习对于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关键性意义。孔子自己即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强调自己所取得的学识成就都是源于勤奋学习,而非天赋,因此竭力“劝人学”^{[4]92}。他甚至自谦说自己的天赋比不过颜渊。譬如在《公冶长》中,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感慨道:“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颜回好学且天赋高,可闻一知十,因此孔子认为颜回可“三月不违仁”,而一般人“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孔子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对现实中的人来说,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已经算是极高的了。

颜回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除了天资高之外,更因为其好学。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这些都说明,圣贤品行与境界都是通过学习而来的,所以后世儒家就反复主张“圣贤可学而至”,如程颐道:“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与?曰:然。”^{[5]557-578}朱熹也说:“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也。”^{[3]306}圣人可学而至,就充分说明人人都能够通过学习来提升和改变自己,学习既是可能的,更是十分重要的。

就学习的重要性而言,《论语》中有不少明确的讨论。比如孔子告诫子路注意“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此章同样是在“劝学”,勉励人们要时刻坚持学习,否则即使我们是在努力追求个人美德的实现,若不通过相应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也会走向各项美德的另一面,形成各种流弊。朱熹就说:“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3]221}“六言”即指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六蔽”就是因不好学而产生的愚、荡、贼、绞、乱、狂。另外,若是一味地穷思竭虑而不学习,也是无益的。对此,孔子以亲身经历明确告诫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可见好学与深思必得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成圣成贤的目的。如此种种,都充分说明了学习在人们完善与成就自我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学习的根本目的

至于学习的根本目的,孔子最为后世所称道并重视的一个说法,就是强调“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

者为人”(《宪问》)。荀子曾对这一句话做过解释,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古之学者为学即是君子之学,其“为己”是指德行上的自我完善,自美其身;而今之学者所为的是小人之学,荀子说其“以为禽犊”,杨倞释“禽犊”为“馈献之物也”^{[6]7},意谓今之学者不过是将学习成果视作进献于国君以换取功名的贡品,而学习也就成了一种工具或手段。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就引《荀子》此语作为理解“为己”与“为人”的重要资料,并引汉代经学家刘向在《新序》中所记墨子的看法:“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如?’对曰:‘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7]586}可见先秦思想家对孔子学以“为己”或“为人”的看法基本一致,都是以“为己”即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根本,强调学习在道德上的切身受用;“为人”即取悦他人而获取名利,强调的是学习被物化了的工具属性。而不同的学习目的则代表着君子与小人的不同道德境界。

《论语注疏》于此也有较为详细的讨论,其引汉代经学家孔安国的解释说:“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4]195-196}意即“为己”是在学习中实有得于己而能运用实践,“为人”则是仅能口耳记诵,却未能实得于心。北宋的邢昺对此作了进一步疏释,说:“此章言古今学者不同也。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4]196}这说明,“为人”之学显然只是学到皮毛而已,未能触及到学习者的心灵而对其道德与精神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论语注疏》又引南北朝时期的范晔所云:“为人者冯(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4]196}强调“为己”之学的关键在于对“道”的体认。基于前人的理解,朱熹亦就此指出:“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3]194}在朱子看来,孔子论学习的“为己”与“为人”,就学习的终极目的而言,为学者都应将孔子的这句话牢记在心而“日省之”,时刻提醒自己学习的真正的目的在于“美其身”,即自我完善,自我成就。

正因为君子从学皆以“为己”而“美其身”为根本目的,所以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孔子学易的目的便在于“无大过”。朱熹解释说:“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3]125}在人格养成方面,比较理想的状态则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论语注疏》解释道:“此章言知者明于事,故不惑乱;仁者知命,故无忧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惧。”^{[4]122}朱熹则在《论语集注》中从理学的本体论、工夫论层面,对此作了更深刻的发挥:“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3]147}在他看来,孔子所讲的知、仁、勇三种德性的养成,都是基于对天理的掌握,而在日常生活中循序渐进地做功夫。首先是要通过学习掌握天理,对天理有透彻的了解之后,遇事便能不惑;随后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以心中所怀之天理的信念克除一己私欲,达到此心“纯是天理”的公正、光明境界,自然就不会患得患失,焦虑难安;当心中光明正大,无有私欲,理直必然气壮,满心全是浩然正气,自然无所畏惧。《礼记·中庸》里,孔子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有此三达德,也就能够达到孔子提到的人生最高道德境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这一道德境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当人通过不断地学习、修养而最终成为道德完满的人,其心性自然也就完全合乎道德,所以其思维言行受其心性的驱动也就完全合乎道德规范,从而体现为一种充分的道德自由境界^[8]。这一道德自由境界归根结底,就是儒家所极力宣扬的圣人境界。所以,总体而言,孔子关于为学目的的讨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圣贤人格境界的养成。

三、学习的基本内容

我们要明白的是,《论语》关于学习内容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君子来说的。而且这里的君子既是以位言,也是以德言。比如《论语》记载,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这里就明确强调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而不是针对“小人”设教和论学。在《尧曰》中,孔子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二程的弟子尹焞就说:“知斯三者,

则君子之事备矣。”^{[3]241}可见命、礼、言是成就君子之德的基本要素,而要知晓三者,自然就必须通过学习。在《子路》篇,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和如何打理花圃,孔子不仅不肯教,还批评他是小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里的“上”,自然也是指作为统治者的“君子”。而且孔子还提出了礼、义、信三种君子应该学习和掌握的道德能力与素养。

在《颜渊》篇里,还记载了孔子教学的基本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朱熹引程子的话解释道:“程子曰:‘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3]126-127}认为其中以忠信为本,而学文、修行都是对忠信之德的运用实践。宋人邢昺在《论语注疏》里则讲得更明确:“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此四者有形质,故可举以教也。”^{[4]93}春秋时期原本就十分看重忠、信之德。北宋邢昺以忠、信皆是指可以明确感知到的真诚、真实、不虚妄的人格品质,而行是心中之德性的生活实践,文是自先王传承而来的可见的典籍文献。文、行、忠、信都是可以明确感知、有迹可循的道德规范或相关的文字记载与传承,即邢昺所谓“有形质”,是能够通过口耳传授的,同时自然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

当然,就儒家所主张和教导,也是为学者所必须体认和掌握的道德理念与知识范畴等而言,上述提到的命、礼、言、义、文、行、忠、信等远不足以涵括。甚至也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范畴,如仁、智、勇、敬、诚、中庸、孝悌、慎独,等等,以及为政、礼乐、经济等等各方面的知识。但上述内容实际上都蕴藏于儒家的经典之中,在孔子的时代是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更早的则是礼、乐、射、御、书、数之专属于贵族子弟的“六艺”设计,如《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些教学内容自然也都符合“有形质”的标准。但从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些表述来看,孔子最重视的、核心的教学内容则主要是诗和礼,所以古人一直就有“诗礼传家”的说法。比如,在《季氏》篇就记载了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字伯鱼)的教育,说: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宋人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就指出:“此章勉人为诗、为礼也。”^{[4]230}孔子对自己的儿子与其他弟子一视同仁,同时他着重提到了教学的两大关键内容:诗与礼。诗与礼是学生必学的基本内容,是因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关于前者,邢昺解释说,这是因为“古者会同,皆赋诗见意,若不学之,何以为言也?”关于后者,他亦指出,这是因为“礼”体现的是“恭俭庄敬”之德,而“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不学之,则无以立其身也”^{[4]230-231}。

学诗以为言不仅是指学会富有文采甚至诗意地表达,更多的则是要通过诗歌的学习以充分了解世态人情,从而言论合理适度。比如《阳货》篇中,孔子也就提醒弟子们要学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并教育其子伯鱼道:“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关于学诗的“兴、观、群、怨”及事父、事君等意义,朱熹分别作了解释,其内容可以看做历代注解的代表。简言之,就是指学诗可以“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强调“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指“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因此,“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3]221-222}至于后面孔子对其子的教育,则是因为《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里的首要篇章,乃周王朝道德教化思想的标志。孔子认为年轻人必须首先学习这两篇,否则将如同站在高墙面前无法找到出路。朱熹解释说:“《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3]222}所言即是此意。

至于学礼以立身,首先,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华夏文化与文明一直都是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及文明系统之内,立身处世必然要以礼为准则、规范,“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其次,又是因为“礼主敬”“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左传·僖公十一年》)“敬”是“礼之本”,这是说礼最基本的道德内核为“敬”。而“敬”又是“德之聚”,因此“能敬必有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人所具备的道德品质、素养都能在其日常礼仪行为中通过行礼以敬而集中呈现出来。最后,“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礼记·乐记》)礼的基本性质就是对中正之道的维系,其对人的言行表现则要求“庄敬恭顺”,而后者又是由前者所决定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正无邪”更为重要。朱熹就曾明确指出:“礼贵得中。”^{[3]84}意即人对于礼的实践和运用应秉持中道精神,以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既合乎理性也合乎道德要求的理想状态。这就在道德要求之外,对礼的践行者在理性、智慧方面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要求,体现了对君子综合素养的重视。

孔子在《子路》篇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北宋邢昺就说这一章是在强调学以致用:“此章言人之才学贵于适用。若多学而不能用,则如不学也。”^{[4]173}可见,无论《论语》列举了多少学习的内容,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君子之能力、德性的培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学习方法的选择同样十分重要。

四、学习的基本方法

《论语》关于学习方法的讨论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学无常师,其二是一以贯之。关于前者,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堕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关于文武之道,贤者与不贤者的认识各有所得,对孔子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以谦虚的态度向遇到的每一个值得自己学习的人请益,以完善和成就自身的道德人格,是臻至圣贤境界的一大关键要素。除了学无常师的方法之外,孔子也对子贡讲了自己的另一重要学习原则,即“一以贯之”。其曾问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何谓一以贯之?《论语注疏》中,何晏解释说:“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4]207}用现代学者杨逢彬的话来说,也就是指“用一个观念把学到的知识贯穿起来”^{[9]275}。但这“一个观念”并非一般性的观念,而是具有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的观念,也就是所谓“元”或“会”。究其实质,此类学习方法也就是要求善于提纲挈领,把握根本。

除了上述学无常师、一以贯之的学习方法之外,孔子还对弟子谈到了其他的方法。比如在《论语》开篇就提到“学而时习之”。无论历代学者是将“时”理解成“在一定的時候”“在适当的时候”,还是理解成“时常”;也无论是将“习”理解成演习礼、乐,复习诗、书,还是理解成温习、实习、练习的意思^{[10]1}，“时习”都是在强调对所学的内容通过反复地回顾、应用来予以强化与巩固,以使之默会于心,成为真知。另外在《为政》篇,孔子也讲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朱熹解释道:“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3]78}可见同样是强调要时常练习、巩固所学的知识,以达到融会贯通,甚至能在此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见解,从而让学习到的知识和理念真正为我所用。

在《子罕》篇,孔子则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曾参在其他场合也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也是两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前者强调的是榜样的力量,后者强调的是朋友间相互砥砺的作用。对于后者,《礼记·学记》同样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可见在学习中,既需要主动亲近贤者而“思与贤者等”^{[4]51},也需要结交真正的朋友,在和朋辈的反复切磋交流中砥砺共进。

在《为政》篇,孔子又提到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孔子的门人子

夏则在另外的场合规定了学与思的具体要求,如学应当是博学,思应当是近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宋人邢昺于《论语注疏》中就说:“此章论好学近于仁也。”^{[4]256}并视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为比较重要的学习方法:

博,广也。笃,厚也。志,识也。言广学而厚识之,使不忘。切问者,亲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不泛滥问之也。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不远思也。若泛问所未学,远思所未达,则于所习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纯笃,今学者既能笃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4]256-257}

这说明君子为学一方面要博闻强记,一方面又要脚踏实地。具体言之,就是所问所思都应是当下最紧要、最切身的学问,不得好高骛远。

《论语》中关于孔门师生所论学习方法虽然多样,但其中体现出的勤奋、谦虚的学习态度和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则是贯穿始终的。

五、理想的学习态度

《论语》关于学习态度的讨论,最核心的就是“好学”。在孔子看来,学习者唯有好学,学习的方法、内容、目的等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何谓好学呢?子夏在《子张》篇曾做了一个界定,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注疏》解释道:“此章劝学也。亡,无也。旧无闻者当学之,使日知其所未闻。旧已能者当温寻之,使月无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谓之好学。”^{[4]256}从中可知,“好学”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每天都要通过学习来更新、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其二,是“学而时习之”,不断地温习、巩固已有的知识,以使之经月不忘。既“温故”,也“知新”,通过天长日久的积累,必将成就斐然。这也正是好学精神的体现,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学习态度。在孔门弟子中,子夏被划入“四科十哲”的“文学”类,就是因为他勤奋好学,在文史方面学识丰富。

在《里仁》篇中,孔子对何谓好学也予以了定义,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朱熹于此解释得很清楚,道:“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然犹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则可谓好学矣。”^{[3]73}结合朱熹所言,我们即可看出,孔子这段话强调的是:君子志存高远,安贫乐道,行事积极却又言论谨慎,可谓德行超卓,但仍不自满,而是努力见贤思齐,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这就是真正的好学。反之,“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耻恶衣恶食”,这正是“志道不笃”^{[4]50}、为学不专的表现,这种人是不足以与之一起学习的。

孔子本人确实也是好学的典范,如《述而》记载,孔子在齐国学习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最后自己都忍不住要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因为其实是在太喜欢舜所作的韶乐了,以至于乐此不疲。此可谓完美地体现了其在《雍也》篇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好学的最高境界便是乐学,即真切地体会到了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愉悦感。孔子无疑是达到了这一境界的。

好学、乐学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论语》中有诸多描述。如《泰伯》篇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就是强调学习时要时刻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做学问好像总赶不上似的,赶上了,又总怕失去。”^{[9]145}在这样一种忧患意识的驱动下,自然也就能够做到不耻下问、积极求教等好学行为了。另外,曾子曾经提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这里的“吾友”,东汉经学家马融认为就是指颜渊,邢昺亦引东汉经学家包咸注“校,报也”,而总结此句是称赞颜渊“好学持谦,见侵犯而不报也。”^{[4]103}从中可见,颜渊不耻下问,毫不骄矜,而且一心向学,“惟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间”^{[3]132},完全不会虑及其他。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其基本性质同于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泰伯》),以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子罕》)等谦逊好学的学习态度。所以,当子贡问及孔文子(卫国大夫,名圉)何以死后被谥为“文”,孔子就指出,是因为孔文子“敏而好

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述而》)。孔文子聪敏却好学,位高却不耻下问,这正是其得以被谥为“文”的原因。孔文子在当时名声并不好,在卫国政坛上的所作所为亦多受人诟病,但孔子并没因此而否定他好学的一面。

而真正的好学者必然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的决心和勇气。在《论语》中,人们为学的基本目的就是实现对“道”的体认,所以“道”也是学习的最根本的内容。朱熹解释这句话说:“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3]94} 朱熹认为儒家的“道”,是指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依据和运行的基本原理。人一生求学,一旦实现了对道的真正把握,即可死而无憾。朱熹还引程子的话予以进一步阐明,“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3]94} 对此,李泽厚发挥道:“这是非常著名的篇章,言‘道’之不易‘闻’,宜穷一生以求之也。”^{[11]125} “闻”在这里也就是指体认、学习。从以上讨论来看,人之求学是终其一生的事情,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对道的领悟。

关于此章,历来也有不同的解读。如《论语注疏》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主要反映的是孔子对闻道之难的悲观态度,说:“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4]50} 但即便如此,以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品质,以及“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的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自然也不会放弃对“闻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一改罗列历代经典注疏的常态,径直以己意解释道:“‘闻道’者,古先圣王君子之道,已得闻知之也。闻道而不遽死,则循习讽诵,将为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闻夕死,是虽中道而废,其贤于无闻也远甚,故曰‘可矣’。”^{[7]146} 刘氏此解着重从先前学者所忽略的“可矣”两字出发,读出了其中可能蕴含的勉强意味,从而指出朝闻夕死乃不幸之事,认为最理想的情况自然是闻道而“不遽死”。如此,往后的人生虽或未必久长,但也必然会在对“道”的持续学习体悟之中成圣成贤,那正是所有为学者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刘宝楠的解读有增字解经之嫌,但其将此章的意义空间填补得更加完整,不无可取之处。而且,其中还强调了闻道之后对道继续“循习讽诵”,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可谓尤其难得。

结 语

以上笔者依据《论语》分析、总结了孔子关于学习态度的看法,结合其论及的有关学习的可能性、重要性,以及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问题来看,《论语》关于学习之道的认识,正是一种堪称典范的儒家学习理论。有人指出,“学习理论是揭示人类学习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解释和说明学习过程的心理机制,指导人类学习,特别是指导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课堂教学的心理学原理或学说。”^{[12]1} 从《论语》记载的相关内容可见,中国早在孔子那里即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且可靠的学习理论体系,而学习理论实为教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关于教育,在中国最早的教学专论《礼记·学记》中就强调:“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建设好国家,管理好民众,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而国家的建立乃文明得以确立的一大重要标志,可见教育亦为推动文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回到《论语》来说,尽管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引导官学下移,推进了教育的平民化,但其学习理论仍主要是针对士人而论,体现出了一定的等级性和局限性。今天的中国,由于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论语》的学习理论反而更具有普适性意义,对人们无论是在校园中的学习,还是贯穿一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学习,都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积极的指导价值,可视为“丰盈充实人民群众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基础,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有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13]。与此同时,我们若要真正合理且充分地利用和发展以《论语》为代表的传统经典中的学习理论,又必然要以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与理性对待为前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 考 文 献]

- [1] 皇侃. 论语义疏[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 黄明喜.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史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3] 朱熹. 朱子全书·论语集注[M].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4] 何晏 注,邢昺 疏. 论语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 程颢,程颐. 二程集(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荀况 著,杨倞 注. 荀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7]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8] 易小明. 道德自由概念探原[J]. 道德与文明,2021 (02):22-31.
- [9] 杨逢彬. 论语新注新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10]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1] 李泽厚. 论语今注今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2] 张奇. 学习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
- [13] 周明鹏.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03):14-23.

Learning for Yourself: the *Analects* on the Way of Learning

Feng B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4, China)

Abstract: The *Analects*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discussions about Confucius' s discussion of the way of learning. Confucius emphasized that people can spread the Tao, and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alent and so on between people, learning is both possible and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most fundamental purpose of learning is to improve oneself and achieve one' s own virtue and talent. As far as the core content of learning is concerned,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Analects*, it mainly refers to poetry and etiquette. In terms of learning methods, the *Analects*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learning from impermanence, consistenc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In terms of learning attitude, Confucius attaches the most importance to being eager to learn, and the joy of learning is the highest learning realm that he highly admires. In this regard, Confucius himself is a model. The various sayings of Confucius on the way of learning presented in the *Analects*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ies of learning, and they are still relevant today.

Keywords: *Analects*; Confucius; the way of learning; “for yourself”

[责任编辑:刘力]